

事件观

趁雪打劫还是雪中送炭,先别急着相互否定

黄■

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让很多人感叹“世道变了”。

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哈尔滨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中。冰天雪地里,几名壮汉穿戴严实,出现在当地的工农大街上,专守着那些在积雪里打滑的车辆:给50块钱,就帮你推一程。新闻中写道:“市民都说他们这是‘趁雪打劫’”。

很快,一项据此设计的社会调查出现在某门户网站的首页上:你怎么看待哈尔滨暴雪有人收费推车?
然而,大众的观感与新闻所流露出来的“趁雪打劫”的评价似乎迥异。对这种行为,七成以上的网友选择了默默点赞:“支持,只是自发的市场行为”。

“东北的活雷锋都到歌里去啦?”见到这样的投票结果,不少人显得很不确定。一位微博实名认证为电脑公司工程师的网友带着浓厚的讽刺意味说道:“牺牲人文精神和文明为前提,大力发展经济,很必要!”还有人恨铁不成钢地上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中国人为什么总在己人有困难的时候,不是伸出援助的手,而是伸出一只想赚钱的手呢?”

另一方面,赞成收费推车的网友也不服气:“双赢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就是被太强的道德观念误导了!”

一样的斩钉截铁,一样的觉得对方不像话。不知有没有网友留言后再翻翻所有评论,觉得双方的相架造型宛如视镜自拍呢?

其实,对于类似伦理问题,不少学者专家多年来进行过各种探讨,但谁都难说自己的意见是唯一论。

可以肯定,这不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想赚钱的手”。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公正》一书中,开篇就举了一个“趁风打劫”的例子:2004年夏天,飓风“查理”横扫佛罗里达州,飓风过境后,当地很多关键物资价格突然大涨:奥兰多一家加油站原价2美元的冰袋涨到了10美元,商店里通常标价为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涨到了2000美元……

一个居民在得知他需要花费10050美元才能请人把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出了如下的话:“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

11月18日,哈尔滨,暴雪已连续下了40多个小时。街道上厚厚的积雪给市民带来许多不便。 CFP供图



性教育,谁没准备好

本报记者 陈卓

虽然提前把“教材”研究了好几遍,但当走进教室时,心理健康老师张晓晓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她要讲解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台下坐着的,除了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还有从当地各个学校赶来听课的老师和校长。

这是济南市历下区准备在全区推行的性教育课中的一节。虽然自称“脸皮很厚”,但张晓晓还是担心,在讲解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孩子们万一提出“精子是怎么进去的”这样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并没变成现实。利用一本叫做《小威向前冲》的绘本教材,张晓晓告诉孩子们,那颗叫做“小威”的精子在一次“游泳比赛”中战胜了3亿个同伴,率先到达终点。这时,身边一个小男孩悄悄问这个扎着马尾辫的老师:“老师,我知道小威的同伴不是3亿个,而是50亿个!”

“我说每分钟都产生好几亿呢!”听到提问,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孩立马插了一句。

“我说小威的同伴们会在48小时内陆续死去!”刚才提问的那个男生不甘示弱地补充。

“提到性教育,我们总觉得孩子们接受不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的往往倒是我们大人。”作为帮助济南市历下区设计性教育课程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评价说。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

就在张晓晓的性教育课开讲前,当方刚把这个话题在一次培训中带给当地的200多名班主任时,“大人的问题”在培训现场被清楚地展现出来。

在从10月25日开始的持续两天的培训中,这位性社会学博士毫不避讳地向班主任们解释,为何在向向学生展示异性的身体图片时,不要笼统地使用“生殖器官”,而要准确地使用“阴道”、“阴茎”等“性器官的名称”。当提到要及时向学生讲解月经和遗精的相关知识时,这位大学教授还有板有眼地讲了一段涉及这个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个企图活跃气氛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响应,台下的老师大多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

“我们学校学生都特别单纯,可能不需要这些,别本来没早熟,听了以后反而早熟了。”一个小学班主任在开讲前小声表达着自己的忧虑。过了一会儿,她又扭头看了一眼同伴,试探着问:“即使讲,内容也不能太

直白吧?”

一个班主任甚至直接提出自己的担忧:“要是给学生看了异性的身体图片,他不满足,再去弄其他的图片咋办?”

“关于性的东西,难道你不讲,他就不会从其他地方接触到了吗?”面对老师的担忧,方刚反问。

从今年年初,他带领一个包括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几名中学生在内的团队,编写了一套有108个教案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济南市历下区就是这套教案库选取的首个试点。

这是中国目前众多关于性教育的尝试之一。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大约5年前就和北京市教委合作,进行“中小学性教育大纲”的课题研究,目前全市共有50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

在在众多推动者中,方刚算得上是观点前卫的一个。在他的教案库中,他不仅为学生们准备了“认识身体”、“爱情观”这样的话题,还有更直接的“性,我们准备好了吗?”、“是否做爱,需要沟通”,等等。甚至,他还主张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色情品,少女援交以及艳照现象。

“我可不是让孩子们去看黄片,而是让他们在了解各方面知识以后更好地做出选择。”在方刚的教案设计中,讲解色情品时,老师会展示国际社会对色情品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引导学生站在各种立场展开辩论。

“我们总说中学生不思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给他们知识,让他们成长。”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急促,“当把各种争论都了然于胸的时候,学生还会把色情品太当一回事儿吗?我觉得不会。无论看还是不看,这件事情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面对老师们的担心,方刚几次提到。

他提到,早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就显示,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22.4%曾有性行为,但其中超过半数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在沈阳的一家医院里,医生甚至发明一个“梳齐耳发,满脸学生气”的16岁女孩儿,一年好几次来医院做人流手术。

面对医生做好避孕措施的提醒,这个女孩儿疑惑道:“做人就是无痛的,没觉得伤害身体啊,这不就是避孕嘛。”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一个教初一的男老师在课间告诉记者,在他执教的班级里,甚至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女生晚上外出

当然,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能解释价格杠杆如何发挥作用,带来好处,但很多人的愤怒与无助不会就此平息。这种情感当然也是真切的。有学者质疑,飓风过境后,许多平民花大价钱买下的服务或物品,看似自由交易,实则在那样的情境下,更接近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关键就是掌握一个“度”。

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这个“度”,或者说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似乎无法单靠宣传和媒体来定调下结论,而应当

是人们借助各种形式的平台进行讨论之后达成的。

就像在哈佛讲“公正”课的桑德尔也承认,判断这些“趁灾打劫”的行为是否正当,需要评估特定情境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不同情况。对于富翁而言,在狂风大雨中为一个汽车旅馆房间或是一车能把他带往安全地带的汽油支付高价,顶多只是件有些讨厌的事儿,但对收入微薄的人来说,付不出这些钱,也许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停留于危险的地方。

但生活中很多时候的例子并没有课堂

上呈现出来的那般极端。比起查理飓风中要花费一万多美元才能从屋顶上撤下来的树,对哈尔滨街头那些在大雪天开车出行的车主而言,50元钱,恐怕还不足以令自己陷入困境。为了那50元而伸出的推车的手,未尝不是一种雪中送炭。

更何况,不少哈尔滨网友也在评论中表示,自己当天就见过很多被困在大雪中,依然互相帮助的人。世道没有那么坏,而我们还握着可能改进的方向盘——不是举着“道德”的大旗一棍子扫倒一片,而是更好地建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

新闻眼

李斐然

人性之道

武汉幸福村最近不太幸福。村里最近正搞城中村改造拆迁,有一块地夹在村子和旁边的市场中间,说不清楚该归谁,双方起了争执。该怎么解决呢?

村里的王书记想了个主意——他招呼人开来三辆渣土车,停在市场大门口,闹着要用泥土占领自己的土地,堵门!书记说,这样能“引起政府重视”,尽早解决问题。

市场的保安跑来阻止,站在车旁跟书记理论。不过,谁也没法阻挡王书记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声指令下去,听话的渣土车不管不顾地把一卡车渣土倾倒在正在营业的花鸟鱼虫市场门口,一下子将几个保安活埋住。等旁人把保安从土堆中拉出来时,其中一位已经昏迷,迟迟无法恢复知觉。

伤员送医院了,网上都在批评王书记,说他不该埋人。但是,王书记自己却觉得很“冤枉”,他跟来采访的记者辩白,倾倒渣土的地方属于幸福村,他只是把幸福村的土倒在幸福村的地上,有什么错?王书记抱怨说:“我现在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

心理受伤的王书记恐怕一时半会儿看不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也许在他看来,埋人堵路都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能保住自己村的利益,其他都不足一提。这也难怪,王书记已经用一车渣土,埋葬了整件事中最该被珍视的常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处。

为官之道

广东有位叫黄志光的干部,天天勤勉于自己的工作中,唯一的缺点是,他似乎一直搞错了工作方向——这位曾经的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每天琢磨各种法子,为自己搭建“保命墙”,想为自己保平安。

来听黄副主席的“保命墙”都包含哪些神奇法子吧:拿着现金有底气,先收个几百万元的红包;买房能防老,再找人送自己一套大别墅;冬虫夏草能养生,那就搞17斤尝尝。哦,对了,不都说烧香拜佛可保平安嘛,黄志光立马又有了灵感,快,把我的名字刻到佛石上面去,供来拜香客跪拜敬仰,让同在佛石上的神灵庇佑保佑!

黄志光的官帽越戴越高,借着受贿堆积起来的“保命墙”也越建越扎实。可惜这堵看似坚固的墙,在广东省纪委下发的一纸文件面前,瞬间土崩瓦解。黄志光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继而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这位渴望保住自己一生荣华的干部,显然搞错了为官的基本常识——用贪腐堆积起来的墙壁,就算垒的钞票再多、佛石再坚硬,都无法真正保住这位59岁的正厅级干部官运亨通。它们不但不会为他挡风遮雨,反而会越来越脆弱,直至最终崩塌,压碎在墙壁阴影里的升官发财梦。

砍伐之道

四川楠木村村民上周决定干一件大事——砍倒村子里活了700年的古树。一个姓王的村民带着一伙同乡,扛着斧头带着吊车,围在古树旁边,连夜要把树砍倒。

为什么要砍树?他们自己也不说清楚。但是他们知道,古树除了挂个牌子,写着自己700多岁,可是一毛钱都没为村民挣回来。如今的楠木村需要现钱,不需要古树。于是,村里两个小组的人跟当地木村厂老板一商量,当即决定,每人分2000块钱,把古树砍了卖了!

可是,这棵活了700年的古树可没那么好对付。700年来,它一路向上生长,不管是燎原的战火,还是震动的大地,都没能撼动它的根基。村民从晚上九点一路砍到凌晨,大树却依然屹立不倒;轰隆隆的吊车想把大树连根拔走,但倔强的古树却不屈服,倒地时还把吊车拉翻,连带着砸中了周围村民的家。

这下子,带头砍树的村民可要赔大了。当地政府暂扣了古树,认定这属于偷采行为;除了支付参与砍树的村民每人2000块钱,他还要为被砸破的家庭支付损失费。算在一块,差不多赔了近60万元钱。

你瞧,村民的确完成了能拿现钱的大事,可他们却并没得到想象中的利益。不仅没赚到钱,还丢掉了一堆东西——700年的古树没了,曾经完整的民居垮了,还有曾让这个村子引以为荣的“保护神”,也随着一心渴求眼前利益的斧子,应声倒地。

不归,学生中有传言“是去援交了”。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那名男老师并不知道。但他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困惑交给了培训主持人。而后面两天的培训,他把名额给了同校的一个女老师,计划让女老师以后和自己合作,一个负责给男生讲,一个给女生讲。

“我明天可以去,但必须讲吗?我不会讲啊!”这个不到40岁的男老师给记者展示了女老师回复他的短信。

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其实,对于坐在台下的老师而言,“不会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

“孩子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现在给他们讲,还不得炸了锅啊。”一个小学六年级的老师说。另一个打扮时髦的小学女老师告诉记者,虽然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频频报端,但在她所在的学校,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并没有被单独强调,而是“和安全教育一起讲的”。在深圳,计生服务中心的陶林也发现,当三年级的小学生被问及“文具店的男老板把两个小女孩带到无人的树林中会发生什么”时,大多数给出的答案是“吵架”、“打架”、“绑架”、“杀害以后把器官卖掉”……很少有人意识到可能会被猥亵。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总课题的负责人,张玫玫理解老师们的顾虑。在大纲设计之初,她曾设想把关于异性身体的展示和讲解安排在小学五六年级,但发现上课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低着头不敢看,甚至还有人羞红了脸。于是,这门课程的开设时间被不断提前,最终发现,当面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时,这样的问题不复存在。

“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受到成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出现‘谈性色变’的情况。”张玫玫解释,“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实际上,在济南,当性教育课程真正在学校开展时,人们才发现,这个至今仍然让有些成年人闻之色变的话题,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并不显得太早。

10月28日,当张晓晓还在准备她的性教育课程时,另一节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性教育课程正在进行。

这节课被取名为“莫名我就喜欢你”的课程,主要帮助学生处理青春期的两性关系问题。看起来,当老师要求男生女生站在台前互相拉手捏肩时,孩子们会因为羞避而对异性同学故意加大力气,而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课程名称时,后排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还悄悄问同桌:“莫名是谁?”

但是,当老师让孩子们偷偷把橡皮皮

进一个写着“Yes”和“No”的信封,来表示自己是否有暗恋对象时,在这个有着45名学生的班级里,写着“Yes”的信封中收集了27块橡皮。

而据讲授这节课的老师康悦介绍,这还是她在这个信封中收到橡皮最多的一次,最多时数量会超过30个。

“我们总觉得孩子接受不了,其实不是孩子有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理有问题。”当地一直进行性教育推动工作的历下区心理教研员马莉告诉记者。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为了打消老师们对孩子接受不了的担心,他提起了一个听起来像是笑话的例子:一个小学生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父母像大多数人一样回答,捡来的。后来,小孩偷偷写下:“我爸妈真可怜,好像好久都没做爱了。”

台下终于出现了零零的笑声。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

“感觉有很多是被派任务来的,有人打着哈欠,有人干别的,该笑的地方没人笑,该记笔记也没人记。后来我越讲越没精神。”讲完第一天的课程,方刚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实际上,这恰如性教育的现状——虽然有不少推动者在努力,但并不总能得到人们热情的响应。

从北京出发之前,方刚得到的消息是,两天半的时间里,将有超过1000名老师参加培训,那将是历下区所有中小学校的班主任。但是刚下火车,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训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训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参加的轮训。

但这样的改动并没有让方刚太过介意。因为这次在济南获得区教育局支持的教育推广,对方刚来说已是遇到过的最高级别了。在此之前,他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同样预计耗时两天左右针对老师的培训,在拖了将近两年后,最终变成了一场专题报告会。

张玫玫也告诉记者,虽然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纲设计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课题的学校实际运行情况也“相当不错”,但对于这项课题结束后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发的一纸公文,在全市范围推广,她还没有把握。“这得看领导的想法,有时候换个领导就换一种想法。”张玫玫笑了笑。

就在2011年,当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长的脚步》的书推出时,因为里边详细讲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提到性交的过程,而被认为是“淫秽黄色作品”。为此,北京市教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这本计划当年9月份在北京

定福庄二小试用的书,“并非北京市的试点教材”,“仅仅是一项性教育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试点、推广计划”。

“那只是男女搂抱在一起,关键部位还盖着被子呢,如果这种图片都不能放,那怎么跟孩子讲解什么叫性行为,什么叫强奸,性教育还怎么做?”提起这个事情,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有点激动。

而他负责编写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为页末附有患病性的生殖器图片,而遭到家长投诉。这本被定位为“读本”的书,初版印的两万册,用了4年时间依然没有卖完。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一位在北京市坚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其实,如果追溯起来,“性教育”被正式提出的历史,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短。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就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性教育的通知》。而在2012年由教育部修订后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要求学校开展包括“青春期教育”在内的心理健康教育。但这并没有给性教育的尴尬境地带来多少改变。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学,中小学归各省市区教育厅管,在这个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或者老师愿意冒这个险,何必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凭着老师的积极性,校长的责任感,体制上没有保障。”

作为其中一名“有积极性”的老师,同时担任济南历下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的马莉告诉记者,大约3年前,由于自己的儿子即将上小学五年级,她越来越感觉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并准备到上海去听一次与此有关的讲座。当她向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申请带上两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一起去时,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因为领导表示,如果再次找他老师就必须由教育局出面下发公文,但“总不能把性教育直接写进公文里吧”。

“别人看见前面是条河,往往就在河边观望,考虑是趟过去,还是坐船过去。但我不是,我看见前面有条河,脱鞋就往里走。结果发现水根本不到膝盖。”马莉如此总结她当时的状态。

而当记者问及济南的性教育推广是否会中途夭折时,这位瘦瘦的女老师没等记者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历下区不会做这种事情。”稍微缓了口气,她又补充道:“虽然我没有面对面向领导汇报我们在进行的性教育,但所有的通知、图片,领导都会看得到。领导到现在还没找我谈,没说不行就代表行。”